

第一阅读

严平《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

喧哗与孤独

□刘伟

事无成。多么坦诚,却又多么悲凉。

经历了一系列的运动尤其是“文革”之后,他们来到了生命的末期,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真诚面对历史。巴金写出了《随想录》,夏衍创作了《懒寻旧梦录》,周扬真诚地向过去道歉忏悔,并与夏衍、荒煤、冯牧等人极力保护电影《太阳和人》,避免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荒煤写了《阿诗玛,你在哪里?》,为演员杨丽坤的平反作出了努力。沙汀、许觉民、冯牧等人也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着余热,为新时期文坛发展保驾护航。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然而,就他们个人而言,他们却也是悲剧的一代。曾经满怀怀着热情奔向革命,孰料却被革命的暴风雨侵蚀得遍体鳞伤,最后留给他们的却是衰弱的病躯与痛苦的灵魂,甚至还有后人的误解与苛责。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写出了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文人的生命悖论。透过重重历史迷雾,本书向我们再度诠释了时代风云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与现实困惑。这一历久弥新的主题,写出了这8位大家内心的痛苦与纠结,更呈现了历史一步步走来的艰辛与曲折。

“身边人”的“温度”书写

该书作者曾为前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的秘书,与这些昔日文坛大家都有过交往,因此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的真实史料,书中鲜有自己历史的史实随处可见,很多更是首度披露。比如周扬对自己“十七年”中所犯错误的概括,夏衍等人围坐一团关于“30年代”的率真聊天、何其芳的那段少为人知的美丽故事,荒煤在长安街发出的那声长叹、晚年巴金与女儿李小林的沉重对谈等等。这些点滴细节,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原有历史的模糊认知,很多困扰我们已久的谜团有了更加准确的答案。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记忆与现有史料里面,而是花费很大气力循着记忆的线索多方求索,寻找佐证,力图真实客观还原他们的人生轨迹,尝试走入他们的内心。因此,最终呈现的这8位人物与既有的“定论”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周扬、沙汀、何其芳诸篇,更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清新:周扬“文革”结束后不遗余力,努力团结众人奋发有为、呕心沥血,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沙汀与生俱来的“硬气”与执拗,睥睨水关10年的困顿换来了一生的“收获”,晚年失明后仍笔耕不辍,抓住宝贵的时间努力写作,写出了《木鱼山》《红石滩》等作品,正如书中所写:“现在,他终于有了一生中期盼的最充裕的时间!”

这8人当中,何其芳尤其引人深思,何其芳近乎诗一样的人生,何其芳到了延安,很快融入到那火热的生活中去,并最终成为了“知识分子改造的好典型”。从此,写《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的诗人何其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忠诚于领袖的党的文艺理论家。他对领袖的崇拜自延安始,终至一生不曾改变,《毛泽东之歌》是他留给世人的绝笔。“文革”中被下放劳改,养猪也是兢兢业业、极其认真。“文革”结束不久他就去世了,这让他的一生更加充满了问号。

书中写出了何其芳的“柳树的性格”,写出了他对领袖的终其一生的崇拜与追随,更通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呈现了何其芳深藏于内的柔软心绪与诗人性情。那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故事中何其芳的形象是久违的,与印象中的何其芳反差极大。作者小心翼翼地写出了这段“青春”的故事,因为这段往事是何其芳不愿让人提及的,但故

事中的何其芳却恰恰才是真实的自己。“他们一起谈诗,谈论写作;一起划船,一起散步,一起坐在公园参天的大树旁看蓝天上静静飘着的云朵……她说,何其芳为她写作的第二首诗是《有一只燕子遇到了风雨》,还有《听歌》——那两首诗几乎是何其芳五六十年代惟一的不为时事写作的抒情之作。”《有一只燕子遇到了风雨》中我们不常看到的“忧伤”的何其芳:有一个人是这样忧伤/好像谁带走了他的希望/是什么歌声这样快乐/好像从天空降落到他的心上?《听歌》则写出了“青春”热烈的何其芳:啊,它是这样迷人/这不是音乐,这是生命!/这该不是梦中所见/而是青春的血液在奔腾!

这也正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人物的侧面,尽可能地还原历史,让我们最大可能地逼近书中的这些人物。正如历史是立体的,身处历史中的人也是多面的,夏衍有执拗,也有反省,写过《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的固执小文,也写过《懒寻旧梦录》这样的生命大书。他们身上有着太多谜题,有太多的不可理解,这也是作为个体的人的魅力所在。因此书中的人物都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充满温度的普通人。

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

书中的8位人物,因其举足轻重的文坛地位,他们都与新中国文坛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因此,他们中的有些人也颇有争议,其中尤以周扬为甚。书中花费了很大的笔墨写周扬这一人物,作者写周扬,有出于“同情之理解”,也有淋漓尽致的揭露,秉笔直书,尽可能挖掘周扬坚硬外表下的柔弱内核。书中重点写了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世纪30年代、延安时期、1964年文化部“整风”、“文革”后。每个阶段用力不一,着墨不同,对周扬的是非功过不粉饰、不避讳。30年代的周扬是鲜明真实的,夏衍记忆中的周扬是这样的:“他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去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是潇洒。”这是周扬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潇洒”时光。后来的他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让人捉摸不透,就连他身边的人也很难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正像荒煤所言他“只谈工作,从不谈心”。

身处延安时期和文化部整风运动中的周扬,俨然变成了政治的化身。书中写到延安抢救运动,周扬在大会上宣布:一定要把抢救运动搞下去,就是搞到剩我一个人也要搞下去,就是鲁艺全是特务,就我一个人是共产党员,我也能战胜你们! 1964年文化部整风,周扬为了紧跟领袖的意志,完全不顾他和夏衍、荒煤等人的情谊,甚至一直瞒着他们,以致被蒙在鼓里的夏衍气得大骂周扬。

“文革”后,周扬逐渐地意识到自身的错误,开始真诚地为过去的荒唐行径忏悔。第四次文代会上,作者亲眼看到了周扬真诚的泪水。新时期文坛出现纷争时,周扬更是多次在自己家中召开老同志座谈会,努力地团结各方力量;面对可能出现的政治批判,他更是自觉地出面保护影片《太阳和人》,避免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可谓是用良心良苦。至于后来周扬在批判中倒下,以致一病不起最终离世,则是为他的充满争议的一生画上了一个苍凉的句号。

往事如烟,书中的人物早已成为故事,他们的命运沉浮,他们的荣辱成败,也最终留在了过去的时空。真诚地面对他们,面对他们背后的那段潮起潮落的历史,反思并从中汲取力量,或许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最大价值。

创作谈

2015年9月14日,吐蕃特高原东北边缘祁连山中段的宗务隆山。

汽车在寂静空旷的山谷行驶,我们不时停下来一边聊天一边看山,四周的群山上多是白垩纪的石灰岩形成的悬崖峭壁和柏树。初秋的风和两只山鹰轻轻飞过高耸入云的山岩,秋风拂动着山岩间一株株翠绿的柏树,周围只有柏树枝叶的摇曳、风和山泉的低语以及山鹰翅膀那若有若无的啸声。牧人们已经搬到了秋营地,毡房和帆布帐篷旁边是碧绿的山坡和吃草的畜群。张承志阿哈从北京带给我的字幅是他手书的“祁连隔大陆,黑湖横半空,人是那哪儿,山海结弟兄”。字幅中附有蒙古文的“那哪儿”一词是蒙古语“兄弟姐妹,伙伴,志同道合的人或同志……”“人是那哪儿”可以解释为“普天之下的人都是兄弟姐妹”。

在蒙古——尧熬尔语中“库库津尔”意为青海湖或盐湖,指的就是青海湖。“哈拉津尔”意为黑湖,指的是如今叫做哈拉湖的祁连山主峰脚下的那个大湖。青海湖和哈拉湖的直线距离为400—500公里,哈拉湖面积仅次于青海湖。

我们在返回的途中去看望我在14年前开始整理这部口述史而采访过的那些“那哪儿”——牧人们,旅途中的每一件事都至关重要。从德令哈乘火车到了海晏县已是傍晚,昂青才旦的弟弟达瓦开着车来接我们。在宾馆放了行李后,我带着口述史去原贝勒旗蒙古王爷的孙子才宝先生家。他站在马路边等着我,当年帅气的才宝先生老了胖了,头发也白了。我们到他狭小的廉租房内聊天,才宝先生说:“唉,那一年啊,你来了我给你说了那一席话后感觉肚子里的苦水倒出来了,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舒坦了……”才宝先生的感慨中带着些许忧伤和辛酸。他的老伴华茂给我们端来了新鲜的酥油、曲拉、白糖、糌粑和滚烫的奶茶。我把蓝色的哈达和白毡子送给了他。他告诉我扎藏寺的罗医生尼玛去世了,曾任祁连县副县长的聂步腾也去世了,秋什江如今在西宁……

第二天我们乘车穿过默勒草原,勒勒草原原名来自旧名“乌兰木仁”,蒙古语意为红色河流。现在人们把这条河叫做默勒河,下游叫大通河,是黄河的支流之一。从车窗里看着道路两旁的白色毡房和简易帆布帐篷前挤牦牛奶的牧女,驱赶牛群的牧人,羊群和马群,起伏的草原和云朵。太阳升起时,阿努达喇的照相机也响起来了,凉风从草地上吹来,草原总是让我们内心无法平静。到了祁连县,远处已被积雪覆盖的乃曼鄂尔德尼神山云雾弥漫,这座神山的汉名叫牛心山、八宝山,吐蕃特名叫阿米东索。住到宾馆后我打电话约了多杰先生,他告诉我那几年我采访时60岁以上的人大半都去世了,沙里、马加阿来、加布桑昂热、达尔龙的老僧人、撒白勒、旦斗沟……

我感觉到一向淡淡的的多杰先生,这一次心情是不平静的。傍晚,我们去看望当年的吐蕃特老僧人洛布丹先生,洛布丹先生的老伴在门口迎接我们,矮小的老奶奶头戴一顶白色礼帽腿微微跛着带我们上了楼。洛布丹先生已经双目失明,削瘦的脸上是深陷的眼眶。这些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呢?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云飞雾卷,山下川地草原草青黄,孩子们变大变老,孙子们又长大,死亡和出生,痛苦和欢乐……

双目失明的洛布丹先生欣慰地抚摸着送他的书,他已经看不到书的样子了。老奶奶也拿起书翻着,她的心中是同样的欣慰。一会儿从野牛沟的秋营地牧场来的儿子官布,天生真诚厚道的他也顾不上风尘仆仆,拿起书翻着,尽管他不认识几个汉字。从海晏县到祁连县,我们谈话的主题仍是1958—1959年海晏县、门源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牧民们的遭遇。洛布丹先生说不远处住着我当年采访过的老人劳布藏,现在也有80多岁了,老伴这几年里瘫痪在床,由孩子们轮流侍奉。

吃过手扒肉和汤饺子我们要道别了,穿着赭红色袈裟的洛布丹先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默默地面向我和阿努达喇。我们还能见面吗?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我们说以后再来看他,有点慌忙地道了别。出了门,橘黄色的路灯下清冷的秋雨在祁连县街道上不紧不慢地地下着,行人和车辆不时从街上走过。

在库库津尔以北,默勒河两岸和祁连山的南麓,我采访过的“那哪儿”老朋友们大半已经去世,当年采访时我曾承诺把他们的口述整理成书后再送给他们。如今,我把不多的一些书送给了这里零零落落的几个故交旧友。而在祁连山北麓的尧熬尔草原上呢?我采访过的人中还有多少“那哪儿”,还有多少当年采访过的故人在世呢?我只知道先后了那个彼岸世界的一名名字:罗布桑皂巴、罗布藏土耳其、瓦什、林木措、泰道尔吉、藏木拉琪、赛布宗琪、仁青卓玛、仁青琦、赛尔藏、叶勒其格塔克、德力格尔、巴特巴斯、诺欧恩、王荫桐……我还能见到几个曾经采访过的旧交?不管怎样,这是我践行的诺言,因为我相信自己是大地上的所有人的“那哪儿”,而地球上的人都应该是“那哪儿”。

很幸运的是,我在自己的族群中拥有能常常提醒我的“那哪儿”——乌鲁·萨格斯,他是尧熬尔族群萨格斯部落的青年学者和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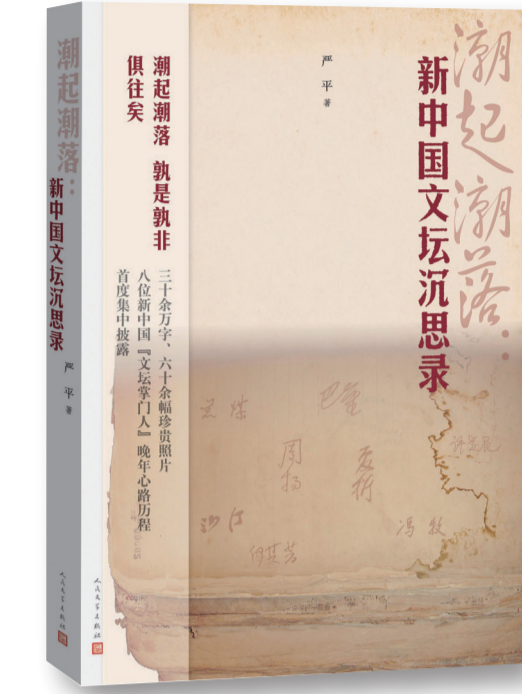
我和乌鲁·萨格斯的深入交谈是从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开始的。那是在祁连山北麓山谷中的一个寂静干净的小镇。小镇的周围都是大大小小的山脉和无数的沟壑,吐蕃特高原的东北屏障。我们在交谈时,窗外清晰地传来乃曼河的涛声,后来交谈的声音渐渐压过了窗外传来的涛声,因为我们俩的话题多半是族群、草原、历史和他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探索。

2004年初夏的一天,当乌鲁·萨格斯问起我的口述史曾受到哪些人的启发时,我给他拿出了《辞皮娃娃兵》和《切尔诺贝利的新祷》两本书,书的扉页有作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那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的速写肖像,映入眼帘的是作者那一双为他者的苦难熬过不眠之夜的眼睛,疲惫而苍凉。画家几笔就画出了她的心情。读过她的书后我明白了,我的心灵和阿列克谢那维奇的心灵走得很近。当时我把我在祁连山南北的调查整理成的一些初稿也叫做“文献文学”,直到后来乌鲁·萨克斯帮助我学习了一些整理口述史的方法使我受益匪浅。

许多年里,我除了读亚力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和瓦兰·沙拉莫夫(Vladimir Shalamov)文字以外,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那维奇是我精神上更重要的“那哪儿”。

大地上的所有人都应该成为『那哪儿』

□铁穆尔



新中国文坛已走过60余年,有过低谷,有过高峰,有过喧闹,有过沉寂。在这其中,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拨乱反正,革故鼎新,突破重重阻力,文坛开始步入正轨。《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就是以第四次文代会前后的文坛境况为切入点,抚今追昔,写了8位新中国文坛大家周扬、夏衍、沙汀、何其芳、荒煤、许觉民、冯牧、巴金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沉浮,真实而冷静地描绘了新中国文坛前30余年的波谲云诡、万千气象,以及这些举足轻重的人物“执牛耳”者在大的时代变动中的人生抉择与心路历程。通过与他们的亲身交往以及大量的史料爬梳、多方求证,作者沉静客观地描绘了这8位文坛大家在上世纪80年代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

生命的悖论

8位作家,在上世纪30年代都是不折不扣的书生,他们创作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批评等,大多曾名噪一时。巴金的《家》、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至今仍是传世的经典作品。后来他们参加革命,有的还去过延安(1937年9月,周扬奔赴延安。一年后,荒煤、沙汀、何其芳等人也陆续到达延安),经历了延安“抢救运动”的洗礼,逐渐开始褪去青春的色彩,变得成熟老练,身上呈现更多的色调。

作为左翼作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领导岗位,在文化部、作协、社科院文学所等成为了领导者。被时代所裹挟,不论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都走上了一条近乎相同的道路,承受了共同的荣辱沉浮。但这并非他们的初衷,因为他们原本性格不一,更多时候是出于对党的忠诚与服从,才毅然决然地承担了历史的重担。

在工作中,他们一方面努力履行着自身的职责,另一方面却为无法继续创作而苦恼不已。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次周总理问起荒煤的年龄,荒煤脱口而出:年过半百一

品鉴

在细微处舒展辽阔

——评赵峰旻散文集《烟火流年》 □北乔

赵峰旻的《烟火流年》有着浓郁的生活在场感,心灵的微妙颤动如音符飞扬,经由才情灵化的语言诗性丰盈,美文的气质扑面而来,清新而雅致。在词语和感觉优雅滑行的同时,她透过生活或粗糙或纤细的质感,探寻一方水土的文化根脉,触摸性情人生的世相纹理,以广阔的视野,扎实思索的力度,从而让作品如同6月的麦田,麦香浓郁,麦穗实沉,醉人的风景与怡心的收获在同一片天空下荡漾。赵峰旻是这样专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细腻的情感和丰富的文化内在拓展作品的生命力。在尘世的烟火味、生命的韵味和灵魂的体悟中寻找个性化的书写,使叙事于诗意的轻盈中饱满文化的厚重和思想的力量。

《烟火流年》的优美是显而易见的,灵动的文字闪烁质朴、清纯之美,如春雨滋润心田。赵峰旻不刻意追求语言的精致和浮华,而用心于激活语言自身的生命力和审美力。她善于在不同的场景和情境中,让语言在合适的语感和语境中自然生长,不事雕琢,也非做作。语言不再是叙述工具,而是从她心里开出的花,花香中有世俗的气息,也有灵感的呼吸,更有语言不同向度的灵性张力。《落花自有情牵处》的字里行间花香丝柔纯美,小家碧玉般的心绪情愫如轻雾萦绕。《葵园野趣》果然是野趣十足,泥土、庄稼和乡村人合为一体,铺叙那离我们很远却始终在心头乡土味。《禅风茶韵》的行文有坐禅入定之境,阅读时总觉得眼前有一柱淡然空灵的檀香。《此心安处是吾乡》带我们走进草原,叙述也随之广阔而豪迈。《春寒赐浴华清池》携历史的风尘和岁月的光泽,让

我们听到已经远去的声音,沧桑中透着清亮。语言如同河水一样因势而行,随情而歌。她摒弃了那种自恋的自言自语或故作呻吟,而是走进生活现场,聆听心魂的律动,亲近地与自己与他人万物对话,内情与万物、心声与天籁成为完整的生命体。她的敬畏与珍爱,让华丽的语言有了血色,让舞动的语言有了质量。如此,《烟火流年》光鲜多姿且质地丰蕴的语言,带给我们的是有温度有生命的或秀丽或朴素之美。应该说,《烟火流年》有效地回避了当下一些散文的通病,看上去很美,但往往呈现没有血肉的苍白与无力。

从《烟火流年》中,我们感受到赵峰旻致力的于生活与内心的真诚互动。写作之于她,是真正意义上的与世界的对话。她以平实的态度和敏感的心念,从生活的本相捕捉文学情思。她不做预设性的寻找或所谓私我化的对接,自然感在前,寻找在后。如此,她的写作不再是自恋地摆弄自家的小花园,而是让自己成为一棵树,扎根大地,拥抱四面八方来风。《烟火流年》远不是小众式的闺房情调或故作呻吟的自我陶醉,而是接纳了生活的广阔图景,飞溅起人文关怀的朵朵浪花。

赵峰旻之于文化的挚爱和潜入式的书写,既坚守本土文化,又满怀大文化的视野。从故乡出发,在生活现场行走,《烟火流年》那种无处不在的文化气息,如同乡村的炊烟,自然飘摇,又风情万种。这是乡愁的念想,又是文化的咀嚼。东台大地的历史风物和人情俗事,在许多篇什里穿行,比如西溪、安丰古街、黄海生态林、乡愁城事等等。这里没有文化说明者的身

影,没有一意孤行的说教,也没有借文化自说自话。历史的背影和当下的喧嚣,岁月的积淀和此时的思绪,在赵峰旻的笔下亲密地拥抱着在一起。她不是在写文化,而是以文化之心注视身边的一切,让文化之味在作品中荡开涟漪。在深情诉说故乡文化的同时,她又常常立于文化的制高点,体味文化的辽阔与博大,寻找生命之地文化的那条小河。《开在时间上的花》是日常生活的细密再现,在忙乱的细碎与记忆的厚重的挟裹中,之于细微的感动,之于高远的瞭望,都有文化的涌动。她总能在文化的稳重中体察到生活的灵动,在凡尘俗念的风中呼吸到文化的性情。

可以说,《烟火流年》中的分辑名,既是倾泻赵峰旻的写作理想,又是重现她写作行走时质感清晰的印迹。清茶皓月照禅心、桑梓耕读、道在日常、一粒微尘、大声小说、诗说中国,在这些路标式的词语下,是她把生活者与写作者的个性融合,把文化书写与书写文化、小我情思与大情怀汇入了同一条河流。

赵峰旻的写作收获,自然与她的生活状态和写作路径是分不开的。《烟火流年》的开阔源于她虔诚地让心灵回归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得益于她内心风景的浓情释放。她是县级电视台的记者,处于外面的世界与乡镇生活的交界地,可谓“左右逢源”。放下笔,她是真诚的生活者,吸纳灵气,回到书案前,肉身离开了现实,文字依旧在生活里畅游。这与她的那些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一样,新闻性中带着体温,离开了电视画面,就是一首品味独特的散文诗。在写作实践中,诗歌、小说、散文诗、



解说词以及文论性文章,她都有相当的收获。女性的细腻、体验的多元化、文化的雄浑和纯正的文学理想,让她的散文既细致入微又大开大合。这些都是散文创作的沃土,让她的散文具有柔美与坚韧同在的品质,而《烟火流年》,正是这一品质的集中展现。

靠近《烟火流年》,处处有烟花的灿烂和花瓣的身形情容,走进《烟火流年》,我们会发现那漫天飞舞的其实都是有生命有灵性的蝴蝶。它们不是在舞蹈,而是在天地间飞翔,坦诚它们的生命姿态。相信赵峰旻是以《烟火流年》告白对散文的理解与渴望,让美不再轻飘,让叙述不再腻歪,专注在文化的土壤里成长创作,让生活与心灵相互映射。阅读《烟火流年》,我们可以轻松滑行,又可以驻足细品。《烟火流年》让我们看到了散文在轻与重、细微与宏大的叙事中诚实而自信的步伐,我们心中的散文身影逐渐清晰明亮起来。